

清代思想史论

汪学群 武才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思想史论

汪学群 武才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思想史论/汪学群,武才娃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004-6066-4

I. 清… II. ①汪…②武…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8889 号

策划编辑 郭沂汶
特约编辑 李天勇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 × 640 1/16

印 张 33.75

插 页 2

字 数 43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清代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有清一代，古代思想的诸种学说与形态都得到了回归、再现，宋明理学延续下来，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等得到复兴，佛教、道教并存，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以时间为序来谈清代思想，依次是清初，理学占主导地位，先是受晚明影响，王学大师领袖坛坫，后来由于王门后学的空疏误国而受到批评，遂使思想的重心由王学向朱学转变，朱学登上庙堂得到清廷的支持。与此同时，明清之际渐出端倪的批判反思理学、倡导汉学的趋向也在不断扩大，到了清代中期，因编纂《四库全书》等原因内外互动导致汉学复兴。先是东汉古文经学复兴，然后是西汉今文经学跟进，后者假经议政，演成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先秦诸子学在清前期不绝如缕，到了晚清也开始复兴，从而把古学推向极致。清代思想的这种演进似乎遵循着时间愈前，复古愈近，时间愈后，复古愈远的逻辑，以复古开新来概括清代思想的演进，一点也不为过，可以说清代思想以复古开新的模式完成了集古代思想之大成。另外，清代也是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又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以古代思想去沟通或融合西学成了晚清思想的主流。

清代思想涵盖古今中外，而且新旧杂陈，作为沟通古代思想与近代思想的重要环节，研究它使我们认识到古代思想不可能在

近代突然中断消失，同时也认识到近代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或只受西学的影响，甚至是从西方移植嫁接过来的。既然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变是在清代完成的，那么总结其思想的得失与经验教训，无论是对研究古代思想还是近代思想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总之，我们可以在思想上超过清代，但在思想史上却不能跨越它。

相对于清代思想的重要性来说，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的。清社既屋，学术界对清代思想的研究不绝如缕，如经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胡适、钱穆诸大师的努力，已粗具规模。经过一段学术间歇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有关清代思想方面的研究开始升温，一些专著相继问世，给这个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平添了不少新气象。然而相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其他时段来说，这一时段的研究还是稍显冷落，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应注意的是门户之见。门户之见可以说是乾嘉以来汉学的专利。先是汉学与宋学之争，后是汉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确影响了他们的形象。应该说当时的汉宋之争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表层上是训诂考据与义理之争。汉学讲训诂明而义理明，其本意是不否定义理，而认为义理应从训诂、考据中出，才不至于蹈空论虚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汉学把训诂当成手段，从训诂中引出义理。但其流弊发展为不谈义理，一些学者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从事考据，把训诂当成终极目的。宋学讲义理也讲训诂考据，只是他们认为从训诂考据不能自然而然的引出义理，其中间要有个思考的过程。但一些学者由于过分强调义理，给人以空疏之嫌。其实考据与义理本来就是相互统一的，两者之争不过是各有偏重而已，因此才有后来的汉宋兼采之说。

其二，深层上是儒学正统之争。汉学宋学都把自己当成是儒

家正统，而视对方为非正统或异端。应该说两者既有合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偏颇。汉儒之学讲究务实求真，关心日用伦常等形而下方面，宋儒之学具有思辨性、哲理性，尤其建构道德形而上学，他们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功不可没。但汉学不懂得宋明儒学当时所遇到佛老的挑战，吸取佛老，并与之相抗衡，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宋明儒所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儒家经典中也有其内在的依据，只不过把它们加以深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宋学重视性与天道，流于空疏，忽视对日用伦常的关注，也为汉学所不喜。由于汉学宋学为褊狭的心态所束缚，不可能把古代思想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到思想发展过程在其不同时期的时代特色，以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从而衍生出的不同学说或形态，因此形成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这种门户之见也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研究汉学或宋学，由先入为主而逐渐变成爱屋及乌，进而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门户之见愈来愈深，导致清代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分裂。有些治清代的学者只谈学术而不谈思想，或者相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从历史看，受清末民初以来民族观的影响，以为清朝是满族人统治，一切都不好，由政治落后腐败联系到思想也无建树，并冠以满清，以示歧视。这种排满反满所形成的定式一直影响到后来，以至于后来的清代思想方面的研究进展迟缓。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完整地把握清代。由于清初尊奉宋明理学，不脱明代遗绪，因而把原本是清初的思想向前移，归为明清之际或明代（不是从时间，而是从思想继承角度立论），又由于以1840年为界把其后的清代思想归为近代，这样清代大体只包括中期，或者说乾嘉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学术似乎只剩下汉学（没有关注理学及其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学的重点在考据、训诂、辑佚，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把散见的汉人经注归

纳整理出来,使汉代的学问阴霾一千多年后重见光明,其功不可没,在文献上给予肯定。但在思想上大都给予否定,因为这时期的学者缺乏思辨性及思想创新。因此哲学精英们研究的兴奋点在先秦、汉代以后至清以前那段,如魏晋、宋明时期等,有清一代落得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还有一个原因也制约着清代思想的研究,那就是现代高等教育重在专门化,文史哲是分家的。搞哲学的侧重思想,不太关注文献,研究历史、中文的则兴趣不在思想而在文献。众所周知,清儒治学讲考据明而又义理明,以考据推求义理,这既涉及文献工夫,又要有思想性。现在学科划分过细也造成了清代思想研究的薄弱。

当务之急是要打破门户之见,把清代思想当成历史的对象,汉学也好,宋学也罢都不过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史中的不同阶段或形态,都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不足,以平和、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它们,这样就不会重蹈清代汉宋之争的覆辙,陷于门户或窠臼而不能自拔。因此,关键在于汉宋持平。同时要把清代思想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注意到其不同时段的内在线索,以及相互间的继承关系。即使是汉学也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只能说它没有宋明理学所理解的思想,要善于把汉学思想挖掘出来并找出其特色。同样宋学也不能说没有考据,一些精准的考据是宋学做出的。考据与义理、学术与思想虽有偏重,但要兼顾,就思想史而言,要善于从考据中引出义理,从学术中归纳提升出思想,才是关键,才是治学的正道。

基于此,我们试图以“清代思想”为主题,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做些推动工作。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代学术思想主流与演变。包括的内容是清初学术思想承晚明而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批判改造明末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呈现出博大的气象,可谓人才辈出,学派众多,主要有理学、诸子学、颜李之学、经学考据学等。其中尤以理学为主,

王学导其先而朱学后来者居上，表现为由王学转朱学的过程。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学术思想，包括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等学科，都笼罩在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之下，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形成了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乾嘉时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社会日渐衰落使一代学人开始发出对新学术思想需求的呼唤，因此具有经世特点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形成常州之学，经魏源、龚自珍的播扬，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遂成为嘉道时期的学术思想主流。晚清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是理学、史地学兴起，古文经学以见颓势，今文经学则与改良变法相结合，扮演了托古改制的角色，而诸子学的兴起，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多元化了。

第二，清代学术思想论争。这里主要论及的是清前期学术思想之争和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争。清代前期（指1840年以前的清朝）学术思想争论纷繁，既有本土学术与外来学术的争论，也有传统学术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西学，这使中西学术首次相互碰撞，因此引起中学和西学之争。清初学术思想发展承明旧绪，宋明理学内部之间的争论沿袭下来，表现为理学（狭义）与心学的争论。随着对理学批判的不断深入，回归儒家经典运动的发展，经学考据学逐渐兴起，引发了汉学与宋学的争论。这些论争一直延续到后期。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阵地，以革命派所办的《民报》和改良派所办的《新民丛报》为主，论战的十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围绕着民族、政治、社会等问题进行。前期争论学术层面居多，间接连带政治。后期则在政治思想层面上展开，体现了清代学术思想争论的多元性、复杂性。

第三，清代前期哲学思想。清前期是总结古代哲学、开启近代哲学的历史时期，名家辈出，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向高峰。清

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均有超越前人之处。乾嘉时代，虽然考据学大盛，戴震、焦循、章学诚、阮元等在哲学上也不乏独标新意，使传统哲学更加务实。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形而上慢慢地落实到形而下，由抽象思维向日用伦常转进。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中思辩的成分愈来愈淡，务实的色彩愈来愈浓，批判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也逐渐为正面的服务、建设所取代。一句话，哲学变得更加实用了。

第四，清代前期伦理道德思想。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前期伦理道德既有承续传统的一面，又有批判、开新的一面。清儒通过对宋明伦理道德学说的批评，在道德观、理欲观、人性论和义利观等领域提出一些新观点，从而把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清代前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伦理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在感性层面上，对宋明以来伦理异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陋习给予猛烈的批判；在理性层面上，对道德、理欲、情理、人性、义利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强调个性解放，高扬主体精神，把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起点，对近代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第五，清代前期传统宗教思想。主要讨论清前期传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主要流派及思想。它们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并由此构成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但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道德、艺术、民俗诸方面，对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六，清代初期经学思想。清初顺治康熙两朝虽以理学为盛，但其末流弊端已显见，补偏救弊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拾起古老的经学，作为扭转学风的手段，因此经学之风已渐然兴起。这里所讨论的清初经学主要分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是以经道

合一论为视角对清初经学给予阐释，以见当时经学的特色及学风演变。微观即个案研究，以顾炎武、王夫之的经学思想为例，可以看出清初经学在重考据的同时，也不忘义理的特色，而这与乾嘉时期的经学有所不同。

第七，清代中期学术思想人物述略。清代中期以降尤其是乾嘉道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逐渐趋于务实求真，考证经史子集等，为学者们所崇尚。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遂使所尚演成一时之风气，造就了一大批通经博古的学者。由于篇幅所限，只选择 15 位学者，略述其行谊大要，以见其治学精细严谨，且学有专长，为推动学科的专门化，以及近代学科建立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八，清末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这里所讲的清末政治思想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思想。改良派以康有为《孟子微》一书为例，重点阐述了他借诠释《孟子》一书以西学补充印证中学，发挥托古改制的政治主张。对革命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包括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变革、构建民主共和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也在清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九，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举要。钱穆、冯友兰和徐复观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各有特色。作为史学家的钱穆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重视文献与学术思想的互动，以此梳理出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并指出其贡献。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把清代学术思想置于经学时代之下，站在哲学高度对清代学术思想做了很好的概括与提炼，抓住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与特色。徐复观虽说不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而见长，但其《清代汉学衡论》长文对清代汉学的阐释，大体反映了当代新儒家对清代思想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

产生深刻影响。

以上所论涉及的清代思想，包括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宗教思想、经学思想，以及政治思想几个方面，虽非全部，但也大体反映其思想的主流。我们以史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阐述，勾勒出清代思想的特色、轨迹及贡献，则就不枉初衷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清代思想的研究是以专题形式出现的，由于不同专题回答不同的问题，其视角、侧重点不同，因此阐述相同人物，征引相同文献，其用心、含义是不同的。总之，研究是初步的，结集的这些文字，既是对以前研究的小结，也是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做些铺垫。

最后要提及的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编审郭沂纹女士的鼎力相助。

作者 2006 年 9 月 20 日

识于京北慧忠北里陋室

目 录

序	(1)
清代学术思想主流与演变	(1)
一 清初学术思想	(1)
二 乾嘉学术思想	(12)
三 嘉道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动	(25)
四 晚清学术思想	(34)
清代学术思想论争	(54)
一 清前期学术思想的论争	(54)
二 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	(80)
清代前期哲学思想	(112)
一 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的哲学思想	(112)
二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128)
三 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	(143)
四 乾嘉时期的哲学思想	(158)
清代前期伦理道德思想	(171)
一 经世致用的道德观	(171)
二 个性解放的理欲观	(177)
三 性一元的人性论	(196)
四 尚功利的义利观	(209)
清代前期传统宗教思想	(217)

2 清代思想史论

一 道教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思想	(218)
二 佛教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思想	(227)
三 民间宗教主要派别及思想信仰	(243)
清代初期经学思想	(250)
一 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250)
二 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271)
三 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	(287)
清代中期学术思想人物述略	(322)
一 古文经学家	(322)
二 今文经学家	(352)
三 经史、诸子学家	(376)
清末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392)
一 康有为《孟子微》的政治思想	(392)
二 革命派的思想宣传	(409)
三 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的政治思想	(425)
四 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来源	(443)
五 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内容及评价	(462)
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举要	(476)
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76)
二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清代部分	(492)
三 徐复观的《清代汉学衡论》	(504)
主要参考文献	(520)

清代学术思想主流与演变

王国维在论及清代学术思想时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以最简洁的话语勾勒出有清以来近三百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与脉络。本着这一不刊之论，展开以下论述。

一 清初学术思想

清初学术思想指顺治、康熙晚期的学术思想。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博大是指人才辈出，学派众多，开出学术上的一片新天地。学术思想主流是理学、诸子学、颜李之学、经学考据学，其中尤以理学为主，王学为先导而朱学后来居上。

（一）理学

清初的理学，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剧变，以及内部的危机，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走上历史舞台，大体经历了从尊王阳明到尊朱熹的过程。

清初学术以王学为主，如孙奇逢、陈确、黄宗羲、李颀都是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以下注释皆不注版本，书后参考文献已注明）。

王学大师，但他们大都对朱熹并非一概排斥，主张会合朱熹、王阳明。这里仅以孙奇逢、李颀为例。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学者尊其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主要著作有《四书近指》《夏峰集》《理学宗传》等。他试图以《周易》所谓元、亨、利、贞循环轨迹对理学史进行总结，谋求儒学发展的新途径。他说：“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歿，至是且两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①以元、亨、利、贞比喻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王阳明，虽有表彰王阳明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把理学看成一个有机系统，诸家都是这一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孙奇逢能超越门户之见，从理学总体上把握程朱与陆王之间的关系，进而主张合程朱与陆王于一堂。他还认为调和程朱与陆王不说空话，必须躬身实践。孙奇逢为北学代表，清初北方学者均受其影响。

李颀（1627—1705年），字中孚，号二曲，学者尊为二曲先生，陕西周至人。著作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就地域而言，他虽为关学代表人物，但也调和朱、王，说：“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辞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②李颀反对把王阳明补朱熹，以及朱子后学如顾宪成、高攀龙等补王学看作是简单地向朱学回归。在他看来，程朱和陆王犹车的左右轮，不可缺少。学问

① 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自叙》。

② 李颀：《二曲集》卷10，《南行述》。

两相资才能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他在批判改造理学道德修持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悔过自新”说，强调，古今儒家“倡道救世”，虽各家宗旨不同，大体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以悔过自新来开启人为学的门路。他的“悔过自新”不是狭隘的个人修持道德论，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倡道救世”学说。李颙还提出“明体适用”说，指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①，把为学和经世结合起来。他为清初关学代表，继绪明儒冯从吾，企图重振关学，但其“明体适用”等思想已非关学所限。

尊朱熹的有陆世仪、陆陇其、吕留良、张履祥等。

陆世仪（1611—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思辨录辑要》等。他尊朱，但不争门户，说：“鹅湖之会，朱陆异同之辨，古今聚讼，不必更扬其波。”^②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不应大惊小怪。至于后儒各立宗旨，各分门户，互相诋毁，已非朱陆之争原貌。他认为，程朱的“居敬穷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入门工夫，皆可以至于道。当有人问及他自己的为学宗旨时，他答道：没有宗旨。在他看来，大儒决不立宗旨，应触类旁通，博大精深。陆世仪反对空谈积习，主张经世，把封建、井田、学校视为治国的大纲。他也重视教育，在所主持的书院聘请诸专家名士主讲，积极倡导“切于用世”的六艺实学。

清初谈朱学的还有陆陇其。他与陆世仪并称“江东二陆”。陆陇其（1630—1693年），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著有《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等。他早年徘徊于朱王之间，后受吕留良影响，成为朱学的笃信者。与陆世仪不同，陆陇其仕

① 李颙：《二曲集》卷14，《周至答问》。

②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后集卷8。

清，以钦定的“洙泗干城”、“程朱嫡派”俨然理学正统宗师。他认为，阳明之学不熄灭，朱子之学就不会受到尊重，因此不遗余力的辟王学，学术视角比较狭窄。

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著有《四书讲义》《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他通过“尊朱黜王”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唤起知识界的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① 吕留良生于明清之际，明亡的现实促使他致力于经世之学，把探寻“治乱之源”作为为学宗旨，尊朱熹从属于其经世的目的。他借助时文评选的形式阐发朱熹《四书集注》中的政治思想，不仅主张恢复三代封建、井田、学校旧制，重申“君臣皆为生民也”，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夷夏之际”。在他看来，“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但“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② 这便是夷夏之防。这种民族意识既是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

张履祥（1611—1674年），字考夫，号念芝，学者尊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著述收入《杨园先生全集》。他早年信奉王学，后由刘宗周“慎独”、“诚意”转向朱熹的“格物穷理”。为了表彰朱学，他批评王学说：“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弊至于荡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③

由张履祥首倡，经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努力，朱学遂为清代的庙堂之学。

（二）诸子学的复兴

清初诸子学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傅山。傅山（1607—1684

① 吕留良：《吕晚村文集》卷1，《答吴晴岩书》。

② 吕留良：《四书讲义》卷17，《论语·宪问》。

③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答沈德孚》。